



滴水

穿石。

我們的自主工運路



香港職工會聯盟





滴水穿石

—— 我們的自主工運路

前言

一. 自主工運的興起:六七暴動後工人的自發抗爭 — 3

二. 職工盟成立:從八九民運到九七回歸 — 7

三. 民間社會的覺醒:從反新自由主義到反廿三條立法 — 13

四. 為尊重及權利而戰:從爭取經濟民主到政治民主 — 21

結語

前言



2007 黎鐵工人托着沉重的鐵枝走上街頭

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剛剛搭上工業化的快速列車，經濟起飛，但勞工階層的生活卻非常艱苦。工人每日不見天日地工作，沒有休息日，所得工資微薄至不夠三餐溫飽。港英殖民地政府只著眼於從香港賺取利益，未有提供任何社會及勞工保障。當時連《僱傭條例》也未訂立，只有一條「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限制婦女及兒童的工作時間。

一些工人不忿資方的無情壓榨，亦無懼政府的打壓，投身工運對抗不人道的工作條件。但他們逐漸便發現，他們要擺脫資本家剝削的枷鎖，卻換來了政權對他們的操弄。當年搞工會便要歸邊，不是親共產黨，就是親國民黨，兩派勢不兩立。工人被捲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波，由國共衝突、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幫倒台，每一次都好像是身不由己。一個又一個新的指令，從上級下達，工會淪為執行政權任務的工具。工人當家自主，彷彿只是一個空洞口號，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難道工會註定要受到政權的支配嗎？難道香港工人就不配擁有屬於自己的工會？

說到底，工人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既要反抗資本家的剝削，亦要擺脫政權的操控。

憑著這個自主的理念，數十年來，無數志同道合者前仆後繼，經過無數的付出和犧牲，終於開創出一片工會運動的新天地。

一. 自主工運的興起: 六七暴動後工人的自發抗爭

六七暴動：工運發展的分水嶺

1963年，劉千石當年只得十六歲，他躲進一艘漁船從大陸偷渡到香港，從沒想過自己往後的人生會投身自主工運，更沒料到二十多年後會當上職工盟的創會主席。反右運動期間劉千石於國內就學，目睹過老師被綁起來批鬥，自己亦因家庭背景被視為「黑五類」，畢業後不能找到工作。他逃離了專制社會的政治環境，來到香港後卻又深刻體會到資本主義的剝削。劉千石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荃灣的製衣廠裡做驗貨員，工資太低緣故，沒法吃得起早餐及充實的午飯，因此只能每三天裡，兩天吃飯，一天吃麵包。劉千石當時也認識很多非法童工，借用母親或姐姐的身份證來見工，每日做12小時，每星期工作7日，工資還要比他低很多。

工人普遍生活及工作條件十分惡劣，爭取改善訴求的工業行動此起彼落，但資本家慣以解僱的強硬手段對付「滋事分子」。當勞資衝突爆發，大批警方往往會奉召到場驅散工人及拘捕工會領袖。有警察在背後撐腰，無良資本家更是有恃無恐。勞工大眾積怨日深，終因新蒲崗膠花廠一宗勞資糾紛觸發六七暴動，形成廣泛的社會抗



1967年六七暴動



1967年六七暴動



1967年六七暴動

爭。不過，當年參與的工會均受政權操縱，特別是受到國內文化大革命影響，致使社會騷動發展至後期愈趨暴力化，甚至不惜傷害無辜，令普遍市民及工人對工會組織存有很大戒心。一些早於六十年代後期便成立的自主工會，例如創始於1968年的港九拯溺員工會，便標榜自己以謀取員工福利為優先，拒絕加入任何親中或親台陣營。但早年這些不結盟的工會只屬極少數，並以公務員工會居多。

六七暴動以後，親中工會遭受巨大打擊，工會領袖被拘捕、判監的不在少數，其後加上四人幫倒台中央政府調整了對港政策，親中工會路線轉趨溫和及低調；至於親台工會，亦隨著國民黨政策日益變得官僚化，漸漸與群眾疏離。面對這個處境，七十年代開始，愈來愈多工人繞過親中親台工會自發組織工業行動，爭取加薪及改善工作待遇。例如，大東紡織廠工人、海底隧道焊接工及中華電力公司工人等，都是不滿公司內的傳統工會未能反映訴求，轉而自發組織工業行動爭取改善待遇，獲得社會的同情及關注。

自主工運的萌芽階段

在這個時期，由於親中或親台工會已不能扮演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遇上勞資糾紛變得孤立無助，為了填補這個空隙，一些勞工團體便相繼成立及投入服務。於1968年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簡稱工委會）便在這個背景下成立。工委會在推動早期自主工運方面，發揮了重要影響，及後更過渡成為職工盟。

工委會附屬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除了到教會宣傳工業福音外，亦出版《工人周報》。劉千石1971年加入工委會，最初便是與另一同事梁寶霖，一起擔任《工人周報》的記者，專門從打工仔女角度報導工潮及法庭個案。這些故事反映了殖民地政府的壓制，及親中親台工會的局限，引發打工仔女很大共鳴。

除出版《工人周報》以外，隨著1973年勞資審裁處正式成立，工委會亦協助工友上法庭，提供法律支援，分析個案的利與弊。此外，工委會透過工人小組及勞工教育中心，讓工友可以定期聚會，分享處境，長遠推動勞工權益教育。

進入八十年代，適逢工業北移導致工廠結業拖欠薪金情況十分普遍，工委會處理勞資糾紛的數量相當驚人。1985年工委會接獲7823宗勞資糾紛投訴，其中6100多宗是解僱、遣散及欠薪個案。工委會積極介入勞資糾紛，收到消息後會馬上到達現場組織工人，選出代



表要求與資方談判。當年未有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老闆不出現時，工人不會就此散去，工委會便組織工人佔領工廠。

曾在工委會任組織者的李卓人憶述：當時執笠的廠很多，我的手法是組織工人阻止老闆運貨走，經常要通宵守貨，有幾單還有成500多人一起留守……當時勞工處沒多介入勞資糾紛，有製衣廠執笠，老闆走佬，我們便將貨扣起，貨主前來有30萬現金提貨，即付錢，然後分給工人（抵償薪金）。

勞工立法的黃金時期

除危機介入以外，工委會另一工作重點便是倡議勞工立法。七、八十年代可說是勞工法例改革的黃金時期。工委會整理及分析處理過的大量個案，從個案中進行系統性調查，充份利用媒體施加壓力，並串連其他民間團體成立聯席會議推動社會關注。訂立於1968年的《僱傭條例》早期內容十分簡陋，很多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保障，包括休息日、有薪產假、有薪病假、有薪年假及遣散費等，均是工委會及其他勞工團體從無到有，向政府持續施壓，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成果。

此段時期勞工立法改革包括：

1970年 增訂休息日，但無薪金，無約束性；

1973年 設立勞資審裁處；

1974年 制定遣散費；

1976年 僱員享有每星期休息1天的有薪休息日；

1978年 僱員享有7日有薪假期、有薪病假、婦女有薪分娩假；

1983年 法定假日日數由10日增加至11日；

1984年 遣散費由每服務滿一年可享二份一個月工資提高至三份二個月工資；

1985年 設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1986年 制定長期服務金

可是，面對殖民地政府不民主的政治體制，工委會逐漸發現爭取立法的改革進入了瓶頸，一些關鍵的勞工權利，如不公平解僱法及全民退休保障等，全部遭到政府否決。因此，勞工運動漸漸否定官方的「諮詢式民主」，進而要求真正讓工人可分享權力的民主選舉。及後，工委會及一些自主工會加入了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聯同其他民間團體一起爭取八八年直選立法局議席。

工會教育：香港自主工運的搖籃

發展至後期的工委會，亦開始思索以往工人小組方式的不足及局限。當時，很多社區團體都有成立工人小組，這些小組很倚賴社工，亦很倚靠附屬機構的資源，一旦社工離開便難以維持。此外，行業工人小組的成員大多來自不同廠房，較難集中力量監督企業行為。工委會看到，要突破強弱懸殊的勞資關係，就需由工人小組發展成工會組織，才有出路。

1982年，一次機緣巧合，工委會主任劉千石到歐洲開會途經新加坡，認識了國際食品勞聯（IUF）亞太區秘書馬偉濱，為工委會推動自主工運帶來新契機。當年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馬偉濱期望可在這歷史時刻為香港工人帶來實質支持，於是跟工委會合作，在香港開展一個為期兩年的工會教育計劃。國際食品勞聯亦因此成為第一個與香港自主工運建立合作關係的國際工會組織。

1984年成立的工會教育中心，便是國際食品勞聯及工委會的首個合作項目，初期是支持飲食行業的工友成立工會，後來擴展至其他行業，主要目標是為獨立工會提供有關工運的教育培訓資源。工會教育中心希望在香港推動一種新的工運模式，就是工會內工人可參與決策，建立內部民主制度，定期開會報告工作及舉行學習培訓。

這種模式與香港傳統工會的組織模式有很大不同。後者

是建基於人際關係、人情聯誼、物資幫助或福利，例如每年派發禮品給會員。當時擔任工會教育中心職員的鄧燕娥表示，初入行時有老行尊跟她說，工會組織者最重要是學會「一拿上手就知道臘腸多少斤」，而工會決策文化總是「由大佬話事」。

因此，工會教育中心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要改變既有對工會的理解及傳統觀念。

工會教育中心成立時共有14個自主工會擔當發起成員，當中不乏至今仍是職工盟屬會的工會，包括香港倉庫運輸物流員工協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政府土地及測量人員協會、香港郵政局員工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地下鐵路公司員工協會、香港交通運輸業職工聯合會等。後來工教中心更直接協助工人組織工會，例如太古汽水廠職工會及成衣製造業職工總會等。工會教育中心成為首個自主工會之間交流及學習的平台，為日後成立職工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 職工盟成立: 從八九民運到九七回歸



1988 國際研討會



1988 研討會中嘉賓發言

十字路口上的自主工運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鐵定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中央開始進行基本法的起草及諮詢工作。在勞工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選舉中，勞工界原本協商了7人名單，但在選舉前夕，劉千石卻被親中工會集團踢出名單，反映了中國政府在香港勞工界「排除異己」的統戰策略。工委會積極介入工潮事件，組織獨立工會及推動社會民主化，與當時強調「安定繁榮、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工聯會形成鮮明的對比。

1988年，工會教育中心在香港舉辦了「國際行業秘書處與香港獨立工會運動研討會」，討論如何發展香港的獨立工運，亦有提及自主工會要準備面對中共統戰及邊緣

化的策略。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提到「在九七前的過渡期間，香港之獨立工會無可避免地與目前社會之政治化過程扯上關係」，「除非香港獨立工會能為目前之政治發展建立一套共同的策略及目標，並盡快聯合起來，否則將會被既得利益集團逐一擊破，同時亦會因為力量薄弱而難於抵拒吸納，破壞了工人的利益。」會議通過成立工作小組，負責計劃一些共同工作，包括共同的教育發展策略，以達致建立一個團結獨立的工會統籌中心。

職工盟的誕生

及至1989年，北京發生學生爭取民主、反對貪污的運動，國內工人也組成工人自治聯會聲援學生，基督教



1989 香港市民於機場迎接李卓人回港



1989 剛從北京回港的李卓人

工業委員會積極聲援學生及北京工自聯，工委會幹事李卓人更帶同港人的捐款到北京，一度遭中共扣查。八九民運終以中國政府血腥鎮壓收場，大量學生及工人領袖被通緝及判監，事件令港人憂慮九七回歸後，自由及人權將面臨大倒退。因此，自主工會期望可在九七回歸前建立更堅實的陣營，八九民運直接加速了彼此結盟的過程。

1989年職工盟的籌委會成立，至1990年9月29日正式宣佈成立，由25個成員會發起，代表會員九萬七千人。職工盟的首屆執行委員會由劉千石任主席，教協司徒華任秘書長，香港郵政局員工會蕭賢英任司庫。職工盟成立

時提出了四點方向：

1. 壯大工會力量，爭取勞工權益；
2. 維護基本人權，促進全面民主；
3. 站於基層利益，參與社會事務；
4. 團結世界工人，加強國際合作；

踏入九十年代，港英政府為了光榮撤退大力推動「玫瑰園計劃」，興建新機場輸入大量外地勞工，但玫瑰園最後卻變成剝削廉價勞工的血汗工場。職工盟先後介入泰國及大陸等多宗外勞工潮，揭露中介公司猶如吸血鬼，政府從未作出監管。



1990 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立典禮、
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就職

玫瑰園的外勞工潮

1995年11月，青衣機鐵工程地盤約300名福建外勞爆發罷工，抗議僱主聯同勞務公司剋扣工人工資，為大陸外勞爭取權益的工潮揭開序幕。參與罷工的外勞阿平表示，他花了六萬五千元人民幣才申請到香港。他付給勞務公司的錢都是借回來的，年息三分。來港前，勞務公司對阿平說，每月連加班費有一萬元左右，且交通、吃喝全由僱主負責，但這全是騙人的謊話。阿平來港後發現，每月工資被剋扣至只得四千五百元，扣除交通及吃喝，所餘無幾。

勞務公司收取高昂中介費，更派人在地盤看管工人，還扣起工人的身份證，有工人形容這「簡直就像在勞改」。部份參加罷工的外勞遭到勞務公司恐嚇，職工盟便組織外勞前往新華社請願，要求中方確保國內勞務公司不會阻撓工人追討及秋後算賬。及後，職工盟連同外勞到



1992 玫瑰園內的機鐵外勞抗爭

勞工處與僱主代表談判，資方答應發還被剋扣的工資，及按國家規定收取勞務費。

福建外勞取回應得工資後，職工盟未有就此停步，繼續到了東涌、小濠灣等地盤派發單張，甚至晚上偷進機場的員工宿舍、餐廳接觸工人，鼓勵他們爭取應得工資。來自中國大陸的外勞抗爭一浪接一浪，期間職工盟曾協助約3000名外勞取回公道。

經濟轉型下的工人哀歌

九七回歸前，經濟狀況有如紙醉金迷，地產、金融經濟日益泡沫化，製造業卻自八十年代開始大量北移，數十萬工人要面對經濟轉型的困苦。但很諷刺地，正當大量工人需要轉業，政府卻在回歸前以勞工短缺、工資上漲為理由，分批輸入約四萬多外地勞工。政府為了回應工會停輸外勞的訴求，於是向外勞僱主徵稅，成立再培訓基金。再培訓條例在1992年10月在立法局通過，政府首次注資三億元。

職工盟培訓中心成立於1994年，最初提供語文及電腦技能學習，及後1998年經濟下滑，失業率屢創新高，培訓中心開始提供全日制的就業掛勾課程，並輔以就業轉介及輔導服務。透過這些服務，職工盟接觸到的每一位學員都是活生生的，一位又一位被經濟轉型排除在外的工友。他們很多在轉業過程中屢遇挫折，但仍然掙扎求

存，努力學習。

再培訓學員陳蝶梅的遭遇，便反映了很多中年轉業工人的困境。陳女士十多年來從事製衣業，老闆將工廠搬回大陸後失業，自覺沒有其他技能，本想留在家中照顧小孩。但九十年代政府輸入外勞，令她的丈夫開工不足，收入大減，陳女士又要開始重投社會。陳蝶梅曾分享自己的經歷：「我參加了再培訓計劃，經過多次見工，亦受著年齡及性別歧視，最後找到一份擔任寫字樓的工作，滿以為可以擺脫經濟困境，但好景不常，九七回歸後發生金融風暴，首當其衝又是我們這班既無學識又無競爭力人士……」

**工人要擺脫就業困境，不能單靠技能培訓，
更重要是組織起來爭取政策改變。**

因此，職工盟不單提供培訓，亦透過課程令工人認識工會，了解自己權益。以往很多工人有勞資糾紛才想到找工會幫手，培訓中心卻提供了寶貴機會，讓職工盟可主動接觸及組織工人。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和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便是以職業培訓作為基礎，招募及組織學員加入，逐步發展起來的工會組織。

私人法案：勞工立法的新武器

職工盟成立之初，亦是港英政府在撤離前逐步開放更多直選議席的時期，主席劉千石於1991年便代表工委會參選立法會並順利當選。後來，劉千石於1995年因不滿政府在長服金修訂案「輸打贏要」，憤然辭去議員職位，由當年時任總幹事李卓人補上。

1995年彭定康引入新九組，以職業劃分功能組別，全港打工仔女突然多了一票，職工盟、民主黨及街工組成「民主職工大聯盟」參選新九組，參選名單共有六人，其中職工盟派出三名候選人出戰「製造界」、「運輸及通訊界」及「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結果名單中有四人當選，但除李卓人外，職工盟另外兩位參選人葉國勳及蕭賢英卻未能取勝。

回歸後基本法規定涉及政府政策的私人法案，議員就要得到政府批准才可提出，等同廢除了私人法案的武功。但回歸前，港英政府只限制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帑開支的法案。由於彭定康方案的改革，令民主派在立法會內佔過半數，有機會以私人法案的方式，迫使政府修改勞工法例。1995至1997年，職工盟充份利用這個政治機會，提出了十六項改革勞工法例的倡議，並成功迫使政府對部份建議主動作出讓步，包括將產假及病假薪酬由三份二增至五份四及在《僱傭條例》中新增「終止僱傭金」條款。

不過，針對工會權利所提出的保障建議，政府卻拒絕讓步，職工盟唯有以私人法案與殖民地政府正面交鋒。

職工盟成立早期曾介入的大型工潮，均顯示商界普遍不尊重工會地位，更傾向以排斥或打壓手段來對付工會成員，反映工會權利的保障嚴重不足。

電話公司工潮及國泰罷工



1993 美麗罷工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潮

職工盟成立不久，即介入香港電話的工潮。1991年3月底，公司在未有跟工會協商及諮詢之下，單方面宣佈重組架構，大規模裁員1100人，引發工潮。香港電話有限公司職員協會發起遊行及集會，約3000人參加，並質疑聯席協商委員會不代表勞方。1991年8月，重組後的香港電訊，更無視跟香港大東電報局職員會已簽訂的集體談判協議，單方面改僱傭制度安排，引發爭議。

另一次大規模工潮是發生於1993年的國泰罷工。1992年12月22日，三名發起工業行動的機艙服務員被無理解僱，觸發員工不滿。逾3000名國泰空服員於1993年1月，發動為期17日的罷工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期間過千人到港督府外靜坐，通宵留守。及後資方接受加人手及改善工作環境的要求，但不願意將被解僱的工會分子復職。1月29日，立法局罕有地通過決議，要求港督會同行政局仲裁介入事件，並成立調查委員會處理，工潮至此結束。

集體談判權 得而復失

鑑於香港欠缺工會權利保障，李卓人進入立法局後，隨即部署提出改革工會權利的私人法案。其中最主要就是《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分別規定資方承認工會代表會員處理申訴的地位，諮詢認可工會（代表企業內逾15%僱員）僱傭條件改動的意見，及跟認可工會（獲企業內過半僱員授權）磋商僱傭條件，簽署集體協議文件。至於另一些改動，主要涉及刪除「職工會條例」的不合理條款，包括廢除不容許註冊跨行業工會及經費用於政治用途等限制，以體現工會的自主性。

97年6月，立法局破天荒地通過由李卓人提交的集體談判權條例私人法案，可惜回歸後即被工商界視為首要拔除的眼中釘。來自商界的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後約兩星期，即凍結實施有關法例，及後更在同年10月29日，由

不具民意授權的臨時立法會將之廢除。李卓人為此發起絕食120小時以示抗議，喚起市民大眾及國際社會關注；職工盟亦正式向「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投訴特區政府公然違反《國際勞工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經調查後，對於特區政府的廢法行為表示遺憾，並促請盡快作出糾正。

不過，部份涉及《職工會條例》的改動未被廢除，例如當年取消了對工會聯合組織登記註冊的限制，至今仍然有效。

政權才剛移交，旋即發生粗暴踐踏工會權利的廢法事件，預示著回歸後工人面對商人治港的新局面，前路充滿艱險和挑戰。



1997 臨時立法會凍結集體談判權條例，
李卓人以絕食抗議，引起社會關注

三. 民間社會的覺醒: 從反新自由主義到反廿三條立法

共渡時艱，還是危機轉嫁？

九七回歸以後，相比起新勞工法例被廢除，發生於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對勞工階層帶來的震撼，有過之而無不及。隨著亞洲地區經濟泡沫爆破，香港的經濟迅速陷入衰退，銀行收緊借貸，企業倒閉及裁員加劇，失業率由1998年起持續上升，至2003年達到8.7%。

財團及企業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便是將危機轉嫁至工人身上，包括推出減人手、減薪、減福利等「瘦身」措施，令勞資關係惡化及衝突增加。例如1998年9月，香港電訊在盈利過百億元之下，提出員工減薪一成，工會發動3000員工集會，迫使資方撤回方案；香港飛機工程公司一年內減薪四次，觸發員工罷工三日進行抗爭。在這段時期，「共渡時艱」成為僱主及政府的口頭禪，職工盟就以「反對危機轉嫁」作為抗衡。1998年10月1日，職工盟舉行「反失業、抗減薪、促對話」集會遊行，提倡以社會對話來解決問題。

在這段時期，工會有如「救火隊」，很多工人權益受到損害，都會主動聯絡職工盟，尋求協助。但在抗爭過程

中，職工盟期望不僅為工人解決燃眉之急，而是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爭取長遠保障。這段時間透過介入工潮成立的工會，包括樂依文科技有限公司職工會、東方海外貨櫃司機工會、七海化工（集團）有限公司職工會、電視製作及廣播業職工會、城巴職工會、及CSX環球貨櫃碼頭公司職工會等。但部份新成立工會，由於面對僱員流失或公司結業等問題，無以為繼；部份則選擇由企業工會轉型為行業工會，繼續發展。



1998 香港電訊工潮

政府外判時薪七蚊

金融風暴以後，低薪工人工資急速下滑，社會貧富懸殊日趨嚴重。按統計資料，28萬最貧窮工人平均工資從1997年的4900元減少至2003年的3900元。除了私營機構外，即使政府外判工人也面對超低薪剝削。2001年便有報紙揭發，食環署外判工人嚴伯，每日工作14小時，時薪只得7元，收入低至連板間房也住不起，只好在廁所內留宿。政府以公帑將服務外判出去，最後竟成奸商剝削工人的溫床，引發輿論嘩然。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當年便以政府部門作為優先爭取對象，終於2004年成功打開了缺口，迫使當年董建華政府引入工資保障指引，規定政府外判工人工資不得低於市場同類工種的工資中位數。

其後，工會的爭取對象轉移至大學及資助機構。工會就五所大學的工資水平進行調查，揭露低薪剝削，並與校內的學生組織聯合爭取，所用口號是「良知及社會責任不可外判」，最後科大及理大等院校亦相繼將工資提升。

2010年最低工資成功立法，這個成果亦是經由爭取政府部門、大學及資助機構保障低薪員工的成功經驗，令最低工資得到較廣泛認同累積而成。

假改革 真剝削

政府在財政赤字的陰霾下，肆意借用「新自由主義」的詞藻，推行所謂「公營服務改革」。回歸前，公務員被吹捧為穩定社會的功臣，但回歸後經濟環境逆轉，公務員就立即被疾指為欠缺效率及彈性。政府企圖以此合理化擴大外判及公司化，大量推行合約制聘用模式，背後無非是要減少對公共服務的承擔。

1999年起，政府推行改革公務員體制計劃，改制重點是將永久聘用制改為合約制及臨時工，並大力推行公營部門的外判及私有化。1999年政府決定擴大外判房署服務，30多個房署工會成立「房屋署工會大聯盟」反對有關建議。1999年9月，職工盟協辦了反對政府「假改革、真剝削」集會遊行，兩萬多公務員參與。2002年5月，政府強行通過立法削減公務員薪酬。2002年7月「職工盟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委員會」參與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發起的「反立法(減薪)、要協商」大遊行，共三萬五千人參加。公務員發動的遊行人數眾多，便成為自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上街示威。

此外，政府曾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建議將多個部門進行公司化及私有化。有關建議遭到部門及職系工會的強烈反對，經過勞方的連番抗爭，最後才迫使政府擱置水務署及測繪處的公司化方案。2005年房委會旗下的停車場及商場的資產被私有化，以領匯為名招股及上市。雖然有居民曾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決定，可惜未能扭轉乾坤。



1999「反對假改革真剝削」大遊行，兩萬名公務員憤怒地走上街頭



一筆過撥款：社會福利及教育大變質

除了向公務員體系開刀，政府自2000年在資助機構推行一筆過撥款以來，亦令社會福利及教育漸漸變質。在社福界，1999年社署開始要社會福利機構在2000年到2003年間「資源增值」5%。2000年3月，職工盟全力參與和支持「捍衛社會福利大聯盟」，發起抗議社署推行一筆過撥款政策，反對政府以增加機構用錢彈性為名，將撥款封頂，讓政府可以推卸對社會福利的責任。

政府推出一筆過撥款之後，對學校的基層職工也帶來影響。中小學校內的校工及書記的薪酬職級，從此與公務員體制脫鉤。很多學校為了「縮皮」，乘機將工作外判出去，或大幅削減校工書記人工。學校書記呂玉桂對此很反感，促使她踏上籌組工會之路。桂姐批評新政策不僅使薪酬條件降低，更令校內管理趨向公司化：「從前校長不會用老闆式的關係對待員工，不會強調上司與下屬的關係，大家明白只是崗位不同而已」，她從人的基本關懷出發，憂慮私營化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質，「工作外判出去，同工不會有歸屬感，不會去問不明白的事情，一切照指示去做便可，將來不要期望有人去關心學校。」

經歷金融風暴，薪金及福利被大幅削減，2003年又遭逢沙士掀起的裁員及無薪假風潮，工人處境更是雪上加霜。社會普遍不滿政府及財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董

建華政府在此時更推出侵害人權及自由的廿三條立法建議，對管治集團累積的不滿隨即轉化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當時職工盟及一眾屬會也站在保障勞工權利及人權的角度，堅決反對廿三條立法。

反廿三條立法 人民力量不可欺

2003年初，職工盟積極參與籌組「民間人權陣線」，是該聯盟的核心成員之一。4月，職工盟社會事務委員會對廿三條立法發表意見書，並呼籲屬會以一人一票方式反對立法，與支持立法的工聯會形成強烈對比。5月23日，社委會舉行「基本法23條」研討會，與其他團體不同，討論時更聚焦惡法對於組織工會、工業行動及支持國內獨立工人抗爭的影響。在7月1日「反對23、還政於民」大遊行中，職工盟參與了各項具體工作，動員大約6000名會員參與，包括130名擔任糾察的屬會骨幹。秘書長李卓人作為當天遊行的持牌人，並在立法會提出動議，高調呼籲市民參與遊行。

當日遊行人數多達五十萬人，寫下了歷史的新一頁，最後一批遊行人士抵達政府總部已經是晚上九時。

很多曾參與遊行的工人及市民，自覺不能回到從前，決心走出冷漠和無奈。

這次遊行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反對廿三條立法，正如大會的聲明提到：「我們愛香港、愛這裡的每一個人；

因此，我們更有責任為未來以及下一代努力爭取。在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我們當前的工作，是緊守崗位，凝聚力量，壯大民間社會，繼續抗衡專制橫蠻的政權！」

職工盟更在當天派發宣傳單張，呼籲市民在7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圍堵立法會」。在投票前夕，面對民眾的強大呼聲，建制派陣營內部出現分裂，部份成員陣前倒戈，董建華眼見大勢已去，於是自動撤回23條立法草案。七一大遊行是公民社會一次重大的政治覺醒，不單迫使政府撤回惡法，更令董建華黯然下台。自此每年的回歸日都成為香港工人及市民爭取民主的行動日，風雨無阻，從不間斷。



2002 「反立法(減薪)、要協商」大遊行



2002 裁員潮未有減退，電盈員工抗議



2003 工人全力反對23條立法



2003 面對侵害人權及自由的廿三條立法，工人別無選擇，唯有上街

2002「反立法(減薪)、
要協商」大遊行，職工
盟屬會積極參與



2005 英航工會主席吳
敏兒聯同職工盟召開
記者會



2005 要求地鐵公司為外判員工訂立最低工資



2006 抗議KFC家鄉雞快餐店刻薄員工



2005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代表及幹事，向傳媒講解案情



2007 位於大埔的新職工盟培訓中心開幕

四. 為尊重及權利而戰: 從爭取經濟民主到政治民主

擔得起鐵枝 擔唔起頭家

經歷了金融風暴以後的經濟低潮，香港經濟從2004年開始逐步走出低谷。2004至2006年間，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分別錄得平均超過5%增長。2006年人均生產總值更達到21.55萬元的高位，突破了1997年創下的紀錄。失業率亦由2003年高位下降至2006年4.8%。財團及企業恢復可觀盈利，但工人的薪金及福利條件卻未見回復以往水平，反之，隨著經濟增長而來的是高通脹壓力，令工人生活質素進一步倒退。由於加薪期望與實質調整出現強大反差，一些工人便相繼組織工業行動爭取加薪。

2007年紮鐵工人打響了罷工爭取加薪的第一槍。九七回歸前，紮鐵工人的薪金已有日薪1200元，每日標準工時8小時。其後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陷入低潮，工程數量大幅減少，一小撮不良紮鐵商人乘勢而起，專門以壓低工資來奪得投標合約，大地產商亦樂見其成，因而造就了他們壟斷整個行業的狀況。紮鐵工人工資卻每況愈下，至2007年時已跌至日薪只得600至700元，而工時卻每日增加至8個半至9小時。即使經濟開始復甦，地產市道暢旺如前，但紮鐵工人的工作條件

卻未見好轉。

一位紮鐵工人曾作以下詩句，反映工人不斷付出汗水，卻未能養家的苦況：

血肉築成新廣廈
汗水要將鐵溶化
雙肩能負千鈞重
最難維持四口家

2007年7月勞資談判破裂之後，隸屬於工聯會的紮鐵工會呼籲工人自行決定是否開工，又公然指責職工盟煽動工人搞事。但抹黑言論未有令工人卻步，反而激起更多工人參加罷工行動，高峰期約3000人。罷工最後持續了36日，紮鐵工人憑著無比的鬥志及拼勁，終爭取到日薪增至860元及8小時工作制度。

有份領導是次罷工的黃惠民表示：



2007 紮鐵工人托着沉重的鐵枝走上街頭



2007 紮鐵工人赤膊抗爭，維護飯碗與尊嚴，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經濟好的時候，我地再不團結起來，紮鐵工人就無機會翻身，所以觸發大家齊心，因為不停比人壓榨，不停要接受沒有尊嚴的生活，同埋管理人員的對待，令大家好難堪。」

罷工之後，黃惠民及其他工友成立了「紮鐵業團結工會」，定期會與商會談判薪酬調整，2008至2014年間平均每年加薪10%，在建築行內一枝獨秀，反映工人團結帶來的改變。

至2008年7、8月間，在飲品行業出現了另一波加薪浪潮。維他奶、屈臣氏及雀巢運輸工人，先後因為爭取調整薪金及佣金發起罷工。三宗罷工都迅速迫使資方讓步，成功取得加薪，而且三間公司都在罷工後成立了工會。

大衛決戰歌利亞：碼頭工潮

2009年爆發金融海嘯，工人改善待遇的氣勢受挫，期間工會也忙於介入抵抗僱主侵權的勞資糾紛。及至2013年碼頭工潮爆發，掀起了一場比之前更受本地及國際關注的大規模罷工。

與紮鐵工潮一樣，碼頭工人同樣是面對大財團以外判形式的剝削。外判公司背後的大老闆是國際貨櫃碼頭（HIT），是由擁有百佳、豐澤和屈臣氏等跨國業務的和黃集團持有，大股東是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國際貨櫃碼頭聘用了3000人，其中約1000人是直屬工人，另約2000人是外判工人，他們的待遇也是天淵之別。直屬吊機操作員每日工作6至8小時，其中有1小時休息，每月平均收入19000至20000元。至於外判吊機操作員每日工作12小時，而且不可以落地休息，連去廁所也不能，每月平均只有13000至14000元。至於裝卸員及橋邊理

貨員，則情況更為惡劣，一更最少工作24小時，有些人更會直踩，連續工作24、甚至72小時。工人工資於1996年被削減以後，即使經濟好轉也未有回升，2013年的工資水平比起1995年也不如。工人文學作家岑文勁曾這樣形容工人處境：

「眾多外判商的貨櫃碼頭有如一座金字塔，工人永遠是金字塔的底下階層，一層一層的外判商撈得盆滿鉢滿，他們坐享工人日與夜付出的血汗

……坐享經濟繁榮的塔尖，以為這是他個人榮譽的炫耀?!……但不能!吊機要停止運作，鏟車要罷開!工潮一觸即發!」



2014 未罷工前，碼頭外判工人於HIT總部門外反映勞工訴求，但未獲理會



2013 碼頭工潮引起國際關注，來自美國的碼頭倉庫工會代表專程到港，聲援罷工工人



2013 罷工期間，工人們在貨櫃碼頭內遊行示威

碼頭工人要挑戰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有如大衛對決巨人歌利亞，幸好工人不是孤軍作戰。碼頭罷工取得了社會廣泛的支持，職工盟成立的罷工基金一個月內籌得890萬元，最大筆的捐款是10萬元，其餘都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以支持工人罷工期間的生計。罷工期間，碼頭業職工會在碼頭大閘外搭起帳篷及紮營，接受外間聲援及捐助物資，建成了一條匯集社運及工運人士的「碼頭村」。及後，部份碼頭工人更移師中環長江中心外駐紮，直接向財團的權力核心施加壓力。罷工獲得社會極大迴響，除了同情工人被剝削的處境，更是出於市民對大財團壟斷衣食住行的普遍不滿，與工人同仇敵愾。罷工基金幫補約600名碼頭工人的生計，令罷工得以持續40日，成功取得加薪9.8%的成果。



2006 抗議九巴公司壓榨員工

除了爭取加人工，罷工亦要求資方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及建立勞資協商機制。但資方願意加人工，卻堅拒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反映香港財團不願放棄享受慣了的特權，更不欲看見工會坐大。

下一站 全面立法最低工資

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低薪工人要分享經濟成果，更是難上加難。在職貧窮問題持續惡化，政府外判及資助機構訂立的工資指引只保障約數萬員工，但數以十萬計受僱於私營企業的低薪工人，仍然沒有任何著落。

很多基層工人每日胼手胝足，收入也不足以餬口養家。工資太低緣故，低薪工人唯有不斷延長工時，以換取更多收入。



2006 發起「絕食30行動」

清潔工人陳國東的家庭便是一例。阿東除了正職一份，放工後再到酒樓「倒餸水」，兩份工合計每日要做足十六個半鐘，星期日還到郵局當兼職，而阿東的太太同樣要每日做兩份工，夫妻兩人合共做四份半工，才能勉強維持一家六口的生計。阿東慨嘆：「長時間在外工作，未能盡父母責任照顧子女，奈何做一份工卻養不起一頭家！」

2006年職工盟與一眾民間團體組成「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期望可匯聚各方力量。最低工資聯盟成立以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策略便是發動成員團體進行一連串密集式的傳媒攻勢，不斷揭露低薪工人苦況，及無良財團壓抑工人薪金的真面目。例如2006年8月，同一個月內，分別針對九巴時薪8.3元，及肯德基15元的發現進行抗議。2006年9月中旬，最低工資聯盟更發起了「絕食30小時行動」，希望透過是次行動突出時薪不低於30元的方案。社會訴求最低工資立法的聲音日益高漲，不同界別有代表性的人物亦紛紛表態支持。當年天主教主教陳日君便曾引用教廷的「社會訓導」，支持基層工人應享有足夠養家的「家庭工資」。

2010年曾蔭權終宣佈同意立法最低工資，法例於2011年5月1日生效，時薪最初28元。最低工資實施，標誌著回歸以後爭取勞工立法最重要的勝利。最低工資一役後，職工盟即以立法標準工時作為下一階段的爭取目標。繼任的特首梁振英競選時，政綱中曾承諾「推動標



2010 當年於公廁寄宿，任職清潔工的嚴伯，2001年，朝7晚9每日做14小時，工資每小時只有港幣七元

準工時立法」，但上任後面對各大商會聯合反對，遲遲不肯兌現政綱。梁振英於2013年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但卻沒有明言以立法作為方針，期間委員會曾拋出「合約工時」方案，建議被輿論狠批只是將長工時剝削合理化，完全無助於僱員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合理平衡。

「無良僱主不能橫行無忌！」 首兩宗歧視工會定罪

無良僱主為了打散工人的爭取行動，最想首先去除工會這口眼中釘，令工人失去背後的靠山。無獨有偶，2004年先後發生兩宗工會歧視案件，英航工會主席吳敏兒因接受記者訪問而收到警告信，及4名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的成員因帶領工人追討假期錢，遭新世界集團旗下的惠康清潔公司解僱。遭迫害的工會成員不但未有退縮，反而決心討回公道，挺身而出指控資方歧視工會。

兩宗個案的僱主在法庭上均被裁定罪成，成為香港首兩宗罪成的歧視工會案例。其中一位被解僱的清潔工人代表岑植萍表示，縱然面對解僱後果，「我仍然要追討公司，因為這些無良僱主總不能橫行無忌！」

外籍及本地家務工同坐一條船

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務工約30萬人，主要來自菲律賓、泰國及印尼等地方，她們的處境其實與本地工人沒有兩樣。在2003年香港經濟低潮時，她們被政府單方面減薪400元，變相要為僱主支付新增的外傭稅；但到經濟復甦以後，人工未見起色，繼2004年凍薪，2005年工資只調升50元，被工會評為侮辱的增幅。外籍家務工一直要求取消外傭稅及回復以往工資水平，在職工盟協助下，更向「國際勞工組織」作出投訴。但要到2013年，政府才願意正式取消外傭稅政策。



2009 外籍家務工爭取最低工資保障

2008年，當特首曾蔭權宣佈為最低工資設立跨行業法例時，已傳出消息不會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政府官員解釋，外籍家務工人受入境處最低許可工資保障，所以不用納入法定最低工資保障。但外傭工會反駁，最低許可工資只是由政府一手操縱的行政指令，過往亦曾粗暴減薪，多年來工資調整亦追不上生活指數，所以工人已信心盡失。審議最低工資條例時，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曾於議會內提出修訂，容許以月薪計算外傭最低工資，可惜只得九位議員支持而遭否決。

不論強徵外傭稅及最低工資排斥外籍家務工，均顯示政府歧視外勞的勞工政策。

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務工固然未受公平對待，即使本地家務工的就業也面對很多不合理歧視。例如家務助理沒有



2010 FADWU (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 成立



2010 FADWU 代表聲援IMWU反中介費行動

強積金、職業病不受保障，及因兼職工每星期工時少於18小時而不受勞工法例保護。家務工屬於非正規經濟行業，不論外地或本地，大家同坐一條船，遂決定團結起來壯大力量。2009年11月，本地家務工工會及其餘五個外籍家務工工會舉辦「家務工團結日營」，正式通過籌備成立家務工聯合會。2010年11月21日，來自五個國籍的六個家務工工會組成「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此乃全球首個跨國籍家務工聯會，是家務工組織發展的里程碑。

全球化下的香港反外判浪潮

香港政府一直奉行「不干預主義」及「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當然跟世貿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自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政府部門（包括房屋署、食環署及康文署等）已不斷將工序外判予私人公司，造成勞工市場充斥大量低薪職位。政府不斷外判及私有化公共服務，擴大以市場邏輯運作的領域，最終得益者只是那些在全球自由流動，追逐暴利的跨國企業。說穿了，全球化並非什麼科技結果或經濟規律，本質上其實是「財團推動的全球化」(Corporate - driven globalization)。

2005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引發本地工運及社運團體關注自由貿易帶來的影響。香港在1995年世貿成立時，已經是始創成員國之一。1996年，香港便簽訂了《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同意開放電訊及銀行等服務業，造成後來電訊業割喉式競爭，以及大量裁員事件。九七回歸前，港府更簽署了《政府採購協議》，採購物資及工程需要全球招標，造成由外地輸入的預製件泛濫、本地職位大量流失的惡果。

自由貿易協議與香港工人生活息息相關，職工盟希望藉回應在港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引發更多關注及討論。



此外，很多受世貿協議影響的農民及工人團體，屆時會到香港組織抗議行動，因此職工盟便聯合民間團體成立「民間監察世貿聯盟」，與全球來自不同地方的團體協調及向他們提供支援。其中，最觸目的是逾1000名來港示威的南韓農民，他們示威期間表現了「剛柔並濟」的力量，既有悲情的「三跪一拜」儀式，亦能發動有組織的衝擊行動，更一度成功突破警方的防線。會場外示威者群情洶湧，會場內各國部長亦要為各自利益盤算，結果世貿會議閉幕時未能達成任何協議。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導下，政府外判服務的企圖從未止息。其中康文署外判泳池的計劃，便遇上拯溺員工會的反抗。2003年，康文署就曾計劃將八個公眾泳池的管理外判，因工會威脅在國慶日發起工業行動，才迫使署方打消有關念頭。但至2005年，康文署再傳出消息，計劃外判大角咀新落成體育大樓的全部管理服務，其中包括泳池管理及拯溺工作。工會代表向傳媒指出，外判會令救生員的工作條件惡化，繼而影響服務質素，受害的將會是廣大泳客的生命安危。經過多次向署方反映意見及憂慮，署方仍然無動於衷，工會唯有於8月1日及8月19日兩度發起罷工行動。這次罷工雖未能令署方改變初衷，但已顯示了工會反外判的決心，促使政府放棄外判其他公眾泳池的服務。

政府部門反外判亦促使一些新工會的成立，醫管局2004年計劃外判洗衣房制服組工作，員工為反抗而成立了醫



2005 反世貿抗爭期間，職工盟絕食聲援被捕人士



2005 反世貿遊行

院管理局職工總會；海事處員工不滿署方不斷外判工作，令員工人心惶惶，成立政府僱員團結工會海事處職工聯盟分會，並於2009年年底發起集體請假行動；反外判浪潮更蔓延至紀律部隊，香港警務電訊技術人員工會不滿署方自2004年開始不斷將工序外判，於2010年2月發起集體請假行動，並前往位於灣仔的警察總部抗議。

2013年11月，衛生署六間診所的二級工人，收到署方通知，表示他們的工作崗位將被私營承辦商取代，因此會將她們調職到其他部門，政府第一標準薪級員工總會收到員工求助後，立即介入事件，一星期內收集了員工、醫生及護士合共300多個簽名反對反判，成功煞停了計劃。

除公務員的抗爭以外，在這段時期，同樣受新自由主義衝擊的是社福界同工。社會服務隨著政府於2000年推行「一筆過撥款」，營運方式日漸趨向商業化，僱傭條件及服務質素同受影響。因社福界員工與公務員薪酬脫鉤，其後不少機構被指責剋扣政府撥款及肥上瘦下，導致機構內部的勞資關係日趨緊張。2005年8月，社福界發起「保服務、衛尊嚴」大遊行，3000名同工上街表達不滿。2007年11月28日，社福界3000同工更罕有地集體罷工，抗議一筆過撥款制度導致薪酬下跌、資源短缺等問題，更不滿近年業內充斥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商業化管理模式逐漸蔓延至社會服務的其他領域，連大



2007 社福界大遊行

學教育也不能倖免。立法會於2003年通過了大學薪酬與公務員薪酬脫鉤，結果種下了大學擅自削減員工薪酬的紛爭。2004年中文大學以政府削減撥款為由，提出非教學員工（包括清潔、園藝及保安）減薪三成，而教授及大學高層只需跟隨公務員兩年減薪6%。這是擺明欺負弱勢工人、肥上瘦下的做法。經過受影響員工聯同聲援同學多次抗議之後，校方終作出讓步，大幅調低原有的減薪幅度。此次事件更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的成立。2012年中大校方以「提升管理效益」為由，企圖悄悄地把全數七所圖書館的清潔服務外判，中大員工總會聯合多個校內學生組織強烈反對，最終迫使校方撤回決定。

另一宗改動薪酬的紛爭則發生於浸會大學。2005年12月底浸會大學突然向所有教員及職工發出薪酬改制通知，

要所有人接受以後薪酬不再與公務員掛鈎。有關通知限定7日內要回覆，若不簽署新制合約便會遭解僱。最後有六人不肯向強權妥協，拒簽新合約，稱「六君子事件」。由於六君子堅守立場毫不動搖，加上浸會大學職工會積極策劃聲援行動，最終迫使校方放棄解僱的決定。

工黨成立 強化工人參政

勞工階層面對的社會及經濟不平等，根源於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均。香港的行政長官及功能組別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大部份工人被剝奪投票權，工商界才可如此有恃無恐，阻撓各項勞工及社會政策的改革建議。職工盟的策略是，一方面要強化工人的參政力量，另一方面則要動員群眾力量改變現時向商界傾斜的政治制度。組織政黨的想法，在職工盟內部已經過多年蘊釀和討論，2011年8月，職工盟於特別會員大會上正式通過「職工盟支持及推動成立工黨」的決議案，有關決議案的全文為「通

過支持職工盟推動成立工黨，並於工黨成立後鼓勵會員及屬會加入成為工黨黨員及積極參與工黨事務。」2011年12月工黨正式成立，除了勞工以外，亦匯聚了不少來自社運及弱勢社群的支持力量，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更當選為工黨首任主席。創黨時李卓人表示，工黨不單要站穩勞工立場，而且要連結工人運動，以團結工人的集體力量為依據。

工黨成立後於2012年首次出選立法會選舉，成功有4名黨員當選，包括新界西李卓人、新界東張超雄、港島何秀蘭及社福界張國柱。工黨的成立，意味著推動工人參政的任務未來將由工黨來承擔，而職工盟則會更專注於勞工權益及職場組織。職工盟期望透過與工黨之間的分工，工人參政的工作可以得到更有系統和專注的發展。



2011 工黨成立

民主雨傘四處飄揚

為了爭取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佔中三子於2013年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職工盟全力響應佔中運動及參與其後引發的雨傘運動，動員會員及工人大眾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公佈了2017年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辦法的規定，設下重重關卡，篩選不獲中共政權屬意的參選人士。這些規定包括：1)由一個以財團及建制派團體壟斷，成員人數為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掌握提名候選人的權力；2)有意參選人士必須取得過半數提名委員的提名，才能成為候選人；3)候選人數目限制為2至3人。

人大常委的決定，粗暴地扼殺了實現真普選的可能性，引起社會強烈反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為此發動全港大專同學罷課，反對人大8.31的決定，並於9月11日發表告全港市民書，內容提到「學生今天領頭罷課，展開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波，就是要敲醒社會，我城的喪命鐘經已鳴奏！作為大專學生，繼續埋首課堂自樂於校園而漠視社會危機，絕對是妄顧社會的盼望，亦背棄香港公民社會責任。故此，學生亦必須暫且離開課堂，投入社會運動，逆轉香港厄運。」9月22日上萬大專學生齊集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各院校代表分別上台發言，決志守護我城。

罷課後期，學聯及學民思潮將集會移師至政府總部，晚上集會後更號召參加者衝入及重奪被政府無理封鎖的公

民廣場，部份學生領袖遭警方拘捕及扣留，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聲援行動。職工盟及逾二十個民間團體組成「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位處的金鐘聲援學生。9月28日數萬市民到金鐘參與抗爭行動，突破警方防線，佔領金鐘的主要幹道，後來佔領區更蔓延至銅鑼灣及旺角。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激發了更多市民上街參與抗爭。

職工盟於9月28日晚，緊急通過於翌日發動全港大罷工，抗議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這是職工盟成立以來首次發動的政治性罷工，響應是次號召的工會包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太古飲料職工總會、碼頭業職工會及迪士尼樂園職工會等。太古飲料工會更於罷工當日早上，於廠房外聚集逾300名工會會員，即時召開緊急會員大會，結果三份二會員投票通過支持罷工的動議，充份體現了工會內部的民主決策。

香港的佔領運動受到國際傳媒的高度關注，尤其在運動的初期獲得廣泛報導。期間，有三十多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工會或國際工會聯會組織，以聯署方式對雨傘運動作出聲援。其中，國際食品勞聯及瑞典飲食業工會更組織訪問團，親身來港到佔領區為雨傘運動打氣，展示出國際工人團結的可貴精神。

由11月底至12月中旬，警方於各個佔領區接連強行清場，抬走及拘捕留守至最後的示威人士。其後警方更高

調「預約拘捕」不同政黨及團體的領袖人物，其中包括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副主席郭紹傑及總幹事蒙兆達，分別被控以參加、組織或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罪名。

逾二十萬學生及市民明知抵觸法律，甘冒被拘捕及檢控的風險，參與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公民抗命。

雨傘運動儘管未能取得即時成果，但黃色的雨傘和絲帶四處飄揚，已將民主的種子散落到社會的不同角落。

香港的民主運動，已邁進了自主抗命的新時代。特別是，歷時79日的佔領行動，喚醒了整整一代年青人，當權者已不可能再繼續舊有的管治模式。不過，面對如

此頑強的保守政權，可以預見，真普選短期內未必可實現，民眾有必要作好持續抗爭的心理準備。職工盟期望能將這股剛剛受到啟蒙的政治意識，轉化為推動職場民主化的組織力量，進一步擴大未來民主運動的群眾基礎。



2014 職工盟發動全港大罷工，抗議政府暴力鎮壓



2014 職工盟代表於葵涌警署門外聲援被捕人士

結語

滴水可以穿石嗎？驟眼看似乎不可能，但當我們拉遠一些距離，細看過往的歷史，滴水穿石絕非天方夜譚。我們從兩派親政權工會壟斷數十載的局面，走出了自主工會運動的新路向；從漠視民意的殖民地政府身上，修訂及增加了勞工法例的保障；從盲目信奉自由市場的社會氛圍下，成功訂立最低工資法例；從財雄勢大的跨國財團壓迫之中，爭取到加薪及分享成果。以上種種改變，都是經過無數人努力，一點一滴累積而來。不錯，滴水也可穿石，只要我們團結力量，堅持地幹，便沒有什麼是不可能。

面對經濟及社會環境不斷轉變，風高浪急，我們更需要堅定信念，才能抵擋外來壓力，義無反顧地與工人同行。由成立到現在，職工盟的信念始終如一，就是「自主與民主」。我們堅信，一個受外來力量控制的工會，一定不會是民主的工會，只會依據自上而下的指令來操作。相反，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會，必須以民主的方式運作，才可確保工會的領導層不會腐化，不會出賣工人利益。自主與民主本來就是兩面一體，不可分割。可以說，自主工運的本質就是反專制，絕對不會屈服於獨裁政權。

況且，生於憂患年代的職工盟，成立於八九民運後一年，見證過國內民主運動遭暴政血腥鎮壓，明白到民主的可貴及不可取替。職工盟成立以前，工委會與一眾自主工會已投身八八直選的爭取運動。職工盟成立後，由爭取民主回歸、反廿三條立法、佔中運動到雨傘運動，在歷次民主運動亦從未缺席。從爭取改善勞工保障的艱辛歷程中，職工盟亦深深體會到，官商勾結已被小圈子選舉制度化，只有實現民主才能令工人獲得真正保障。

民主不是賜予的，勞工權益也不會從天而降，這是我們從過往抗爭學會的簡單道理。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其實別無選擇，唯有組織起來，才能擺脫被僱主當作生產要素的命運，重奪作為人的尊嚴和價值。不管是職業司機、地盤工人、辦公室文職、空中服務員或大學教授，都有著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是工人。我們同樣面對強弱懸殊的勞資關係，如果要過更好的生活，便必須團結力量才有成功的希望。在同一天空下，不論何時何地，我們都是同甘共苦的命運共同體。





顧問：梁寶霖、梁寶龍

文字編輯：蒙兆達

圖片編輯：何偉航

平面設計：李蕙如

參考資料：潘文瀚、黃靜文、陳曙峰、陳敬慈及蒙兆達，
「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40年」，進一步，
2012年8月出版。

出版：香港職工會聯盟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地址：九龍彌敦道557-559號永旺行19樓

電話：2770 8668 傳真：2770 7388

網址：<http://www.hkctu.org.hk>

電郵：hkctu@hkctu.org.hk

facebook：職工盟(HKCTU)

2015年9月

勞工權益熱線：2770 8668







職工盟



成立於1990年9月，是一個完全自主獨立的工會聯合組織。
職工盟致力爭取尊嚴工作、公平勞資關係，代表
來自不同行業超過19萬名會員。我們亦一直站穩勞工立場，
捍衛社會公義，推動民主發展。

